

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世界历史叙事刍议

段光鹏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0)

摘要: 中华文明现代力量是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的文明成果, 其话语生成源于世界历史逻辑中“时”与“势”的内外驱动、“守”与“变”的转型升级、“一”与“多”的统筹兼顾。立足世界历史分析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话语呈现, 要从遵循民族文化“普遍规律性”的主体性叙事、坚守社会主义“人民本位性”的超越性叙事、秉持现代文明“开放包容性”的辩证性叙事、加速世界历史“先验预设性”的建构性叙事等方面加以阐释, 从中深刻体悟中国共产党在洞悉本来与吸收外来的基础上造就新型文明形态的创造性力量。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创造性意义绝不仅限于中国, 而是具有超越民族国家视野的话语指向, 有利于为驳斥西方中心论的认知提供新的文明叙事方案, 为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新的文明叙事指引, 为推动人类社会形态演进提供新的文明叙事样态。

关键词: 中华文明现代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 世界历史; 话语叙事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5)04-0153-11

人类的进步离不开绚丽多彩的文明指引。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 兼具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精神气质, 正在以新的力量、新的观念促进其现代转型、现代发展。习近平指出: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 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1][7]}中华文明现代力量在遵循文明发展普遍规律的基础上, 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现实条件和物质载体, 立足并遵循中华文明的独特文化基因和自身发展历程, 具有全新的性质和特征、内容和形式。中华文明现代力量话语是对中华文明转型经验进行话语建构的产物。话语是叙事的基础和前提, 叙事从本质上来说是叙述言说。

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世界历史叙事作为基于中华文明构建世界意义的文明叙事, 其逻辑不是纯粹的哲学逻辑和抽象的话语逻辑, 而是主动顺应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规律, 深刻把握当代世界文明进程的特征和矛盾, 认清人类文明走向, 把握时代发展脉搏, 打开中国理论和思想文化的创新空间, 不断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塑造的相对于“虚幻”文明表达的真正的文明叙事, 其话语呈现是一种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叙事创新。当前, 学界已围绕中华文明现代力量展开了深入探讨, 提出中华文明现代力量体现为我们的自信力空前增强、创新力不断凝聚^[2], 它的产生与发展符合人类文明演进的普遍规律^[3], 明确“两个结合”是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理论根据, 彰显出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理论内涵^[4], 而超越资本主义内在分裂的文明形态的可能性, 正寓于承载世界历史发展使命的中华文明现代力量当中^[5]。然而, 学界尚未将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独特样态纳入内蕴全球化的文明叙事之中, 在中国与世界的互构中把握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体系构成与叙事意义。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世界历史叙事以生成叙事阐明了其话语出场, 以内涵叙事论证了其话语呈现, 以发展叙事说明了其话语指向,

收稿日期: 2024-06-02; 修回日期: 2024-07-16

基金项目: 2024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话语叙事研究”(24YJC710015)

作者简介: 段光鹏, 男, 山东新泰人, 法学博士,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联系邮箱: duangp2022@163.com

包括“为什么”的逻辑式解答、“是什么”的概念式阐释和“有何用”的结果式回应,旨在以深刻的前瞻性与洞见性揭示人类文明发展的深层奥秘和演进规律,在兼收并蓄中以“真正的普遍的文明”引领现代化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

一、生成叙事:透过世界历史探问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话语出场

标识性概念的提出和关键性话语的表达能够体现出话语叙事主体思维的深邃与视界的高远。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话语出场反映了时代的条件和要求,既是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洞察与响应,又是对中华文明独立自主之魂的时代呈现,集中展现了中华民族在文明认知、文明表达、文明境界等方面的新高度。“文明只能在长时段中进行研究”^[6],透过世界历史探问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话语出场,需要把握世界历史逻辑中“时”与“势”的内外驱动、“守”与“变”的转型升级、“一”与“多”的统筹兼顾,由此历史地勘察和标定中华文明的现代历史方位。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生成叙事根植于世界历史语境之中,创设于时代命题之上,透过全球空间中的多元共存性事物及其并置关系,为赋予中华文明现代力量鲜活而具体的话语内容提供了现实基础和可能空间。

(一)“时”与“势”的内外驱动:“历史转向世界历史”提供文明话语的生成空间

世界历史的变迁经历了漫长悠久的发展过程。从原始社会局限于血缘关系的狭隘的群体交往发展到古代的民族内部交往和扩大了的民族间交往,总体而言是地域性的互动和局限性的交往。马克思认为,“历史转向世界历史”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和交往关系的不断发展,人类逐渐打破地域限制和克服各种局限而走向统一的过程。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和发展,以及社会分工和交往程度由肤浅逐步走向深化,以资本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各个交往主体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使得各民族国家不可避免地被卷入由世界历史所设置的关系之中,改变了各民族国家原本自我发展的命运和相对封闭的状态。特别是新兴资产阶级加剧了对海外商贸利益的追逐,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和原料产地而促成了新航路的开辟,“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7](32)},引发了狂热的殖民扩张和商业革命,直接加速了世界历史的形成,打破了各民族国家的封闭性和地域性,摧毁了曾经牢不可破的政治结构和固有势力。

作为东方社会标本的中国同样不可脱离世界历史进程而孤立存在,先前局限于地域的或民族的历史因“时”与“势”的内外驱动,逐渐被纳入世界历史进程的宏观构架之中。在世界历史形成之前,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独特文明史在坎坷跌宕中延绵生发,外来影响很难彻底打断中国特定的民族和地域的独立发展史。随着“历史转向世界历史”,原始封闭、离群索居、孤立发展的历史不再成为可能。近代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被裹挟着卷入了世界历史的剧变之中,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逐步消失。不同于以往相邻地区的民族、国家间发生的冲突,世界历史对中国造成的外部冲击是具有全局性、开放性且难以回避的。昔日闭关自守、迷信“天朝上国”的大清王朝依然停留于旧的思维传统之中,结果却遭遇帝国主义列强无情的践踏和蹂躏,使得“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8]。在看似外部因素的作用之下,旧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秩序中断了,让中华民族感受到日益加重的生存危机。无论是返求国粹以重振中国文化,还是仿效西方以再造中华文明,都以失败告终,而其中的艰难探索与不懈奋斗则为把握中华文明建设的历史步伐和前进方向提供了有益借鉴。当然,世界历史并不必然消灭民族个性,文明不可能只有一种形态乃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在世界历史展开前,中华文明体现了鲜明的“前资本主义”属性,亟待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激活。各民族国家被卷入世界历史进程之后,自然会按照世界历史的内在规律和未来方向促使自身文

明在转型中获得新生和重建。进入世界历史以后，“第二个结合”破解了如何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古老中国实现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难题。从对自身传统文化的反思，到资本主义文明在国人心中破产，再到“两个结合”，中华民族遵循世界历史逻辑、顺应世界历史潮流进行了正确的方向选择，以自身的文明实践推动了世界历史样态的更新和格局的演变。只有将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置于“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宏大叙事情境中，才能考察其现实的话语场域，把握其生成的叙事脉络。

（二）“守”与“变”的转型升级：“交往转向世界交往”催生文明话语的本土构建

“普遍交往”是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概念，标志着狭隘的民族交往逐渐过渡到普遍性的世界交往，人类文明的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相对于以往哲学家片面、孤立、狭隘地解释世界，马克思则是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运用实践思维把握社会发展与人的交往，认为世界历史“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9](541)}。随着世界历史的演进，国际上的各种交往活动由点及面、愈加紧密，“交往转向世界交往”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普遍方式。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9](520)}。世界历史的演进是以生产力的发展和普遍交往的扩大为基础的。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科技的进步，交往范围与程度不断扩大与加深，人类社会逐步由分散走向集中，交往从民族性扩展到世界性。世界性普遍交往不仅塑造了以生产普遍的交换价值为基本特征的物质生产，而且必然导致世界性的精神生产，即“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7](35)}。世界性普遍交往促使各民族国家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互动更加频繁，使人类的生存境遇、发展方式、精神面貌等都实现了飞跃式的发展。“交往转向世界交往”其实就是资本主义文明冲破狭隘的地域性限制奔走于全球，通过交往关系的普遍化蔓延，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的结果。尽管资本主义文明的全球性扩张为交往关系的普遍化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和有益的前提条件，但普遍交往却并未最终实现。普遍交往最终将摆脱资本逻辑主导的交往形式，不再以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为手段，而是力图实现交往关系的平等化和自由化。

在“交往转向世界交往”的过程中更好地叙述中华文明现代力量，使其实现价值外溢和有效传播，必然要求遵循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性要求，以战略性的现实定力和自主品格走向文明话语的本土构建，展现中华文明现代力量所独有的形式与逻辑。中华文明现代力量作为对中华文明连续性特征的自我更新，是中华文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现代呈现、在新的社会形态中的现代创造。现代历史性的融入充分激活了中华文明自身的进步特质，使中华文明更聚焦于现代转化、文明变革等推进历史进步的时代话语，成为中华文明赓续发展的时代篇章。中华文明现代力量既代表着传统文明向现代化方向的迈进，发现和提炼传统文明的现代价值，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又意味着要通过把握文明传承发展的规律性、主体性、主动性，创建区别于西方文明的现代文明新形态。“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1](8)}作为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是在文明史的整体尺度上给予“中国”以文明发展程度的历史性审视与诠释，彰显的是不同民族国家文明形态的多样性、文明发展的可能性，凸显的是对其自身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自信程度。人类已进入普遍交往的全球化时代，共时性的社会结构已然形成，各种文化形态由封闭隔绝的离散时空转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同步时空。叙述好中华文明现代力量，既要在与“他者”文化的交流交往中取长补短，又要把握区别于其他文明的独特禀赋和突出优势，跳出“被言说”的现实境遇，以独立的文化主体姿态在世界文化的激荡中站稳脚跟。

（三）“一”与“多”的统筹兼顾：“文明转向世界文明”塑造文明话语的多样可能

文明是人类在迎接挑战中发展进步的成果，现代文明则是在现代化运动中形成的。现代化作为人

类文明发展的演化过程和目标方向,并非某个民族国家急促而短暂的社会变革,而是发生在世界历史逻辑中的生产方式、社会制度、价值观念、文化心理等综合性的社会变革过程。“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0](8)}现代化作为现代文明的现实表征和标识文明演进的核心术语,蕴含于世界历史的发展流变之中,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鲜明标识。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在孤立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而是在“文明转向世界文明”的际遇中探索出来的,推动着社会向更先进、更高级、更文明的阶段前进。在世界历史逻辑中,民族国家在历史条件和发展阶段上的差异性并不意味着在发展道路上的去同质化,不是以特殊性来遮蔽人类文明进步的普遍性,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多元化文明共生发展。世界历史前进的轨道同时证明,文明发展从来都不是单向线性的,而是具有多样性和复合性。秉持不同价值导向的文明模式,自然会有大相径庭的发展图景。资本主义文明以西方为中心形成了具有绝对权的排他性叙事,沉湎于历时性而遮蔽共时性,把多样的文明事实和复杂的文明进程整合到以线性时间为逻辑主线的叙事框架之中,其本身内嵌着特定的西方立场和价值逻辑。遵循线性叙事逻辑的西方文明话语,具有难以克服的显性矛盾和无法根治的痼疾,从而呼唤文明叙事的空间转向和文明话语的多样可能。

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话语生成遵循着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同时根植于中国国情、历史传承、文化传统和文明特性,蕴藏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情感禀赋和价值追求。所谓的“文明再造”不是“无根”的悬浮存在,而是以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进行“有根”的自觉创造。中华文明现代力量建立在对中华文明先进成果的积极、充分、全面占有的基础之上,传统是文化底蕴与屹立根基,现代是时代使命与发展方向。只有保持“唯一的”文化个性和民族特色,而非另起炉灶,更不能将其割裂,才能深刻展现出中华文明的内在特性。保持文化上的主体性、对自主地位的强调并不意味着服膺于“环境决定论”。因为陷入自我孤立和封闭的文明是没有前途的,取长补短、优势互补从来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常态。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特殊性根源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同时在不断与“他者”的对话和交往中实现了自我发展、自我超越,在“一”与“多”的统筹兼顾中共同标注了其内在特质、历史方位和未来走向。由此,中华文明现代力量既出场于“文明转向世界文明”的宏观背景之下,又代表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独特模式;既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性,又具有人类文明进步成果的普遍性,是充分彰显和发挥自身凝聚力、向心力、影响力的崭新文明话语。

二、内涵叙事:立足世界历史分析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话语呈现

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理解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话语呈现,有利于从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文明发展趋势和演进规律中认清其内涵特质,清晰地把握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时代脉搏和未来趋势。立足世界历史阐发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内涵叙事,要从遵循民族文化“普遍规律性”的主体性叙事、坚守社会主义“人民本位性”的超越性叙事、秉持现代文明“开放包容性”的辩证性叙事、加速世界历史“先验预设性”的建构性叙事等方面加以阐释,深刻展现中华文明现代力量是在洞悉本来与吸收外来相结合的基础上创造的面向世界、指向未来的文明形态。

(一) 叙事原点:遵循民族文化“普遍规律性”的主体性叙事

世界文化是一个色彩斑斓的画卷,由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共同构成,而非千篇一律的设计图或者毫无关联的拼接板。文化的民族化是文化的世界化的前提,若没有文化的民族化,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化便不复存在。因狭隘孤立的地域性局限,不同民族会形成各自鲜明的民族个性和独特的民族文化。

纵观人类发展的长河，文化个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民族的性质特征、价值追求以及未来走向。若丧失了文化个性，抛弃了体现发展动力和价值魅力的民族文化，则必将被资本主义文明的狂风暴雨所吞没。以往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基本上是“狭隘地域性的存在”，摆脱不了发展的片面性和民族的局限性。随着“狭隘地域性的存在”转向“世界历史性的存在”，环境不再封闭孤立，民族间交往日益普遍，民族文化中部分适应普遍交往的亲性和因素在相互交流、比较、借鉴中被充分揭示出来，通过彼此间的普遍交往逐渐融合为世界性元素。各民族的文化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汲取彼此具有生命力的部分而形成了世界文化。世界文化并非脱离民族文化的独立的文化形态，而是各民族文化在世界性普遍交往中平等交流、互学互鉴的产物。世界文化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地方的文学”形成的，离开了民族文化就不可能有独立存在的世界文化。民族文化的世界性则突出地表现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7](35)}。精神产品成为“公共的财产”并非强调各民族文化的“同一化”或某个民族文化的“普适性”，而是强调通过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交锋的漫长历史演进展现出来，体现在其使用时具有公共性和共享性。世界文化多样性并行不悖的“普遍规律性”事实证明，在文化的发展上“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7](35)}。

在世界历史加速演变的进程中，中华文明现代力量必然体现着新的时代特征、新的思想元素，同时具有独特的文化基因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厚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道德伦理、历史智慧、精神动力之中，是与时代特征彼此交融熔铸的结果。中华民族具有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独特的精神标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11]，在价值维度上为开辟世界发展新道路、提升人类文明新境界贡献了文化积淀和历史根脉，同时不断实现着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中华文明再次绽放出夺目光彩，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主体性叙事逻辑强调在遵循民族文化“普遍规律性”的基础上，从地方性知识维度归纳和叙述其话语中的民族性特质和时代性标识，彰显其独特性与原创性。作为一种具有整体性特征的文化和将文化付诸现实的运动，中华文明现代力量在全方位开放中因其恢宏包容、璀璨雄阔而屹立于世界，又以鲜明个性迎接世界文化，不断传承、吸纳、整合人类文化成就和文明成果。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叙事原点是中华文明问题，言说对象是中华文明样本，它是在主体性叙事中打造的具有时代特点的原创性表述，同时在海纳百川、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充分彰显着自身的文化主体性，体现着对人类文明发展意义的深刻思考。

（二）叙事焦点：坚守社会主义“人民本位性”的超越性叙事

人类解放是马克思全部思想的主题。马克思认为，只有消除人对财富的异化或物的异化亦即人的自我异化的途径，达到“人自身的解放”，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本身，使人获得彻底解放的人类解放，才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类存在和个体感性存在的矛盾才会最终消失。“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9](196)}，世界历史的形成作为现实的人的活动，不像唯心主义所认为的那样，停留在思维想象之中，而是需要通过物质的力量和手段才能实现。马克思在思考世界历史发展时，不再是一元地去把握人的解放问题，而是关注客观实在和人的状态，通过对世界历史的考察和对人的生存样态的现实剖析，找到关于人及其发展和实现终极存在的客观规范，以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切入人类在各发展阶段的形态。马克思试图统合客观现实存在和精神价值存在，将人置于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发展之中，注重立足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对人的生产生存活动进行概括与提炼，通过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客观实践的通盘分析，形成关于“人”的客观存在的现实映像，从根本上弥合了以往人与时代之间的裂痕。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人类投身于世界历史的发展时

常会陷入资本裹挟、强权政治、霸权思维等困境,从而掉入失序的泥潭。特别是资产阶级似乎建构出了统摄全球的世界文明叙事,但它却是忽视真正创造历史、创造文明的人民群众的文明叙事。然而,在普遍交往中,个人之间以及“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9](538)},因此,“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9](541)}。

人的解放绝非小国寡民式的封闭性自我满足和自我陶醉,而是要求彻底改变狭隘孤立的民族地域性,在与现代文明的交融中实现世界历史性的人的全面解放。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强势形态,中华文明现代力量超越了资本掠夺的贪婪特性和血腥本质,以国家权力为主导、以生产关系为中介驾驭资本,能够对资本带来的分化力、离心力进行持续的规范和调控,摆脱了资本生产运动的内在矛盾,使资本服从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社会主义发展需要,符合无产阶级阶级自由的必然逻辑和人类彻底解放的文明远景。可以说,中华文明现代力量有着鲜明的人民性特征,始终将人作为文明的实践主体和评价主体。以人民为中心是一种历史的文明本位,人民需要的演进和人民幸福的坐标构成了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根本动力和发展目标。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发挥的作用,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牵引着文明发展的方向,体现出深层的价值理性和价值追求。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叙事焦点是对社会主义“人民本位性”的坚守,阐明了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社会主义价值遵循、道路选择和实践方式,致力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和人的文化素养,带来的现实结果是民生福祉的全面增进和幸福指数的不断提升,从而实现了人的全面发展和为人民谋幸福的实践统一,在社会空间和地理空间上提升了个人解放的世界历史性新境界,体现了对资本主义文明弊端和道德罪恶的全面摒弃。

(三) 叙事特点:秉持现代文明“开放包容性”的辩证性叙事

马克思、恩格斯曾用“现代文明”来指代资本主义文明,认为世界历史的形成最初是由资本主义文明的兴起及全球扩张所推动的,资本和市场的逻辑是资本主义文明开创世界历史的内在逻辑。在《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深入地解剖了资本生产运动,指出资本主义文明“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运动不断地增殖扩张,将地方性的自然经济纳入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把一切生产变成资本生产,开拓了世界市场。资本作为资本家的活的灵魂具有无比贪婪的本性,“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10](269)}。资本在克服民族国家的界限和偏见的过程中具有伟大的历史作用,资本逻辑运动推动资本跨越国界,使得“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9](562)}。资本生产与世界市场确立了世界历史的深刻基础,成为资本主义文明撬动世界历史的工具载体。资产阶级受巨大物质利益的驱动奔走于全球,那些地域的和人为设置的种种障碍被资本的不断膨胀和强势扩张所冲破。资本生产要求不断打破市场界限,为自己生产的剩余价值寻求新的投资空间,把交换扩展到世界各个区域,将整个世界卷入资本的循环圈中,形成经济全球化态势和世界市场,从而为自身的发展获得更大更开放的空间。资本生产运动凭借时空优势同时孕育了历史与伦理二律背反的无法摆脱的内生性困局,这是造成阶级对立、殖民掠夺、对外侵略等血腥文明景象的基础性根源。资本主义文明用资本及市场把持着世界体系的物质力量,掌控着“中心—边缘”型全球社会结构的霸权,即“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7](36)}。在审视和批判资本主义“文明世界的根本缺陷”的基础上,需要塑造打破二元对立、难以调和的叙事格局,实现从文明对抗到文明交流的叙事转向。

回溯人类文明发展的事实和规律可知,文明需要遵循交流互鉴的演变路向。中华文明现代力量作为一种“文明新形态”的本质规定性,以一种发展的历史尺度和视野格局科学地把握人类文明局势,

主张开放包容、和合共生的文明新秩序，坚持以文明交流替代文明对抗，指向多元化文明在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叙事特点就是科学绘制人类现代文明新蓝本、擘画人类现代文明新图景，试图化解由资本逻辑及其文明原则造成的总体性异化危机，为人类文明叙事提供了一种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体现包容开放性的文明叙事。资本主义文明话语的思辨构造割裂了话语呈现与现实分析的内在联系，关闭了文明辩证发展的未来可能性。中华文明现代力量内在遵循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汲取“尚和合”“求大同”等文化智慧，明确文明发展的要求，牵引文明发展的方向，在摒弃以物为尺度的发展和少数人获利的发展的过程中，破除物的世界与人的世界之间、资本与劳动之间、生产与生态之间呈现的对立、对抗态势，以科学的叙事体系确立起新的文明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式，激发了世界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从而有力打破了西方文明叙事掌控权的演进历史、霸权行径和方法论谬论，彰显了世界历史不可逆转的辩证发展趋势。中华文明现代力量话语叙事需要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整合中国形象塑造，创新话语叙事系统，运用好多元化话语叙事、开放式话语叙事、对话式话语叙事等模式，实现世界历史场域内的有效话语表达。

（四）叙事图景：加速世界历史“先验预设性”的建构性叙事

共产主义作为现实运动过程与美好社会理想是内在统一、不可分割的。共产主义作为未来的理想目标、美好结果与应然状态，突出的是在世界历史发展阶段中达到的层次高度和必然走向。共产主义是从现实的人出发，实践地、辩证地分析批判资本主义文明，不断推进人自身发展的持续的历史过程与历史运动。资本主义文明在创造发达生产力和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产生了严重而普遍的异化，不仅表现在其中的固有矛盾阻碍着世界历史的开放与公平，而且人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9](541)}。全球范围内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不平等，根源于以资本逻辑为根本动力机制的普遍交往和世界市场的形成。资本主义文明的固有矛盾决定了人类社会的未来图景只能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文明所带来的矛盾与异化。资产阶级追求财富，试图推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展至整个世界，客观上为理想社会形态的演变创造出了全球性的活动场所。随着世界历史的演进，人类逐渐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隔绝走向交往，既为人类摆脱自然奴役创造出必要的物质前提，又将共同的问题与危机推到整个人类面前。人类历史的发展必将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为世界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开辟广阔道路。

中华文明现代力量以全面开放的视野与世界历史交相辉映，没有游离于世界历史的进程之外，实现了自身文明道路探索与外续发展动力的相互承接，形成了全新的世界历史性的文明实践道路。中华文明现代力量反映的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总趋势，即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文明趋势，以及不同民族走向独立、自主、发展、复兴的文明趋势。作为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成功开创的一条非资本主义的充满生机活力的文明发展道路，中华文明现代力量顺应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聚焦人类社会的前途命运，指向共产主义的理想图景。21世纪的世界正在见证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新形态。中华文明现代力量日益展现出的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包容性，表现出对世界历史演进客观必然性的深刻把握。正是基于“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的视域，中华文明现代力量话语叙事塑造了世界性和主体性相统一的真正的文明叙事样态，展现了在资本主义文明日益暴露其“野蛮”与“伪善”的历史时代，只有通过中国式现代化更新中华文明现代力量，凭借其中蕴含的普遍因素和积极历史因素，才能扬弃“地域性共产主义”，走出狭隘孤立的限定而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中华文明现代力量话语叙事将视角转向全人类，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和合共生”叙事下的天下情怀，努力实现着以世界文明为根基、以共产主义文明为目标的终极建构意义，成为加速世界历史“先验预设性”的建构性叙事。

三、发展叙事：面向世界历史把握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话语指向

中华文明现代力量从文明发展的高度指出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方向，致力于依托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推动，创造出既扎根中国又具有世界历史意蕴的新的文明形态，为人类文明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和因素。面向世界历史把握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话语指向，通过深刻洞察中华文明的历史方位和变革趋势，将对中华文明历史成果的继承在实践层面上转化为建设现代文明的主动担当，为人类文明应对历史变局、破解发展难题提供更多可能，能够契合人类文明应对世界变局、走出世界变局的历史需要，给身陷纷乱迷茫的世界各国指明文明发展的前途与方向，展现出解决人类问题、增进人类福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伟大世界历史意义。

(一) 为驳斥西方中心论的认知提供新的文明叙事方案

根据世界历史的演进规律，文明的发展进步并非单向线性的或断裂的，而是不断进阶升级的。在资本逻辑构设的世界体系中，现代文明被天然地视为资本主义文明，资本主义文明深陷于自我构设的文明话语中。正如艾伦·伍德所说：“就其性质而言，资本主义不可能长久地仅存在于一国内部。”^[12]在世界历史舞台上，资本巨大的复制、整合和创造交换价值的能力，加上不断开拓世界市场、实现增殖的需要，通过全球分工、交往、交流推动其“文明化作用”不断向外扩展，进而制造了“西方中心”的假象，似乎资本主义文明为“文明”一词做了最好的注解。西方中心论作为世界文明秩序的一种“想象”，试图构建人类普遍史，是以“西方文明优越”为价值内核的文明观话语。“西方文明优越”意识在各个层次上不断地被诠释，资本主义文明自诩为“文明”“进步”的代表。在西方文明话语的粉饰之下，“文明”概念成为资本主义以改造“愚昧”“落后”文化的名义行野蛮之事以及对全世界行使文化霸权的话语工具。资本主义文明被宣称为现代文明的“样板”，正如历史学家布鲁斯·马兹利什所言，“它声称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衡量尺度”^[13]。然而，资本主义文明并非如同其自我标榜的那样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制高点上，其内在矛盾和缺陷决定了其越来越走向现代与文明的反面，资本主义“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14]，使得人类文明秩序呈现为一种剥削性和依附性的存在。资本主义文明所传递的“西方文明优越”观念本身就包含着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疯狂扩张和殖民掠夺，伴随着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杀戮、压迫、剥削以满足自我之欲。随着世界历史的演进，资本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采取野蛮和血腥的手段掠夺原料和扩张市场，地球上其他地区的人民遭到严酷的剥削和压迫。资本对资源的掠夺和市场的扩张必将触及底线而无法回头，由此造成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让世人看清资本主义文明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使得整个社会不可避免地日益分化和对立。资本主义文明随着世界历史的进程必将被终结，而不是由其终结历史。破解西方中心论，关键在于破解“西方文明优越论”，破除将资本主义文明定于一尊的企图，切实站在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立场之上，塑造符合人类文明进步潮流的新型文明观，以此为引领对世界文明秩序进行重塑，表征和激活不同文明之善的最大公约数。中华文明现代力量建立在中西文明沟通融合的基础上，要求尊重文明主体之间的平等、多样、互鉴的事实，主动以激活中华文明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无根由的凭空想象，而是建立在新型文明形态之上，它致力于将“天下一家”的政治理想打造成现实，顺应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趋向，实现了“和合”理念的现代叙事和当代表达。中华文明现代力量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己任，以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文明观为价值引领，倡导文明间的共生秩序而非文明优越和文明独大，以相互尊重、平等相

待的原则来把握文明主体之间的共在关系，从而表征了人类文明形态历史演进的基本取向和内在规律，为从人类文明史高度消解西方中心论的幻象提供了新的叙事方案。

（二）为拓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新的文明叙事指引

对于人类文明发展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地域性的物质财富积累和精神认知远远不够，如果没有人类的普遍觉悟，便无法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人类的普遍解放不是地域性的，而是世界历史性的。全球性的财富积累和人类的普遍认知是实现人类普遍解放需要同时具备的前提条件。生产逻辑和资本逻辑的双重作用和支配，蕴含着现代世界的普遍发展原则和根本的动力机制，能够突破局限性、保守性、封闭性等地域性存在方式，实现物质流通和认知交流等交往的充分化。文明的形态及其演进是具体的人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获得的成果结晶。现代文明在生产力和普遍交往的基础上为人创造了普遍的社会关系，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朝着现代化方向不断演进。现代化的本质是文明创造和文明转型，由西方肇始的现代化实践使现代文明一开始更多地表现为资本主义文明。然而，资本主义文明片面追求资本增殖的畸形发展模式符合资本的本性，却不符合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中国式现代化“基于人类社会的高度多样性和多重时间性逻辑”^[15]，破解了资本主义国家形态“文明中的野蛮”的难题，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殖民掠夺、国强必霸的新路，为繁荣发展中华文明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就其本质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文明现代力量在把握人类文明进步的实质与规律基础上的创造和积累，在形式上开创了中华文明发展的新型实践样态。中华文明现代力量依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宏阔主题和丰厚实践，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跨越，科学揭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之可能性的文明逻辑。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1](7)}中国式现代化作为赓续传统文明的现代化以及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断将中华文明发展为新型的、成熟的文明有机体。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世界历史叙事作为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在观念形态和言语表达上的反映，内蕴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精髓与成果，能够客观、准确、清晰地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真实样貌，更加可感可行地向世界展现了现代化的新图景，愈益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征和中国风格，为完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论准则。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世界历史叙事贯通式地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发、演绎与变迁，通过对其民族性特质和普遍性本质在比较视野中的探求，突破了西方提供的统一的、同质的现代文明标准，解构了西方单一线性叙事模式和绝对普遍主义的叙事逻辑；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规律和未来趋势，搭建了文明普遍性叙事的知识框架、因果链条和价值序列，生成了相应的概念化表达、逻辑化论证和系统化知识。

（三）为推动人类社会形态演进提供新的文明叙事样态

“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9](97)}，文明蕴含在人的现实生产生活之中。随着早期人类劳动能力的提升，某些区域的单个文明体日渐形成且不断发展。随着社会分工的更加细致、交往的日益扩大，资本主义文明得以创造。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确立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文明统治，推动了人类社会的交往和文明发展。然而，资本主义文明以资本化为其文明底色，尊崇的是“丛林法则”与“零和博弈”，根本不会顾及自然力的衰竭与无产阶级的悲惨境遇。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资本主义文明引发的问题，表明了依托于私有制的资本主义文明必然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方向，它不符合文明生成演化的科学规律。人类文明必然要从根本上解决现代化给人类带来的各种问题和困惑。反观资本主义文明统摄人类社会发展的几百年历史，西方世界致力于建构的现代化道路包含了种族问题、战争侵略、生态危机等不文明因素，所谓的资本主义文明就是以不文明的方式向世界贩卖“文明”，

对整个类文明构成了严重威胁。人类社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惑和挑战。

社会主义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标志着人类社会真正踏上了自我解放的历史进程,证明依托于私有制的资本主义文明终究会被淘汰。在资本主义文明面对历史难题和现实困境无以应对之际,中华文明现代力量彰显了社会主义文明的特色和优势。中华文明现代力量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和平等性,在对单纯西化的批判中重构了现代化的文明叙事结构,致力于推动中华文明的复兴和社会主义文明的兴盛,同时以辩证方式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坚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6],使不同的文明形态在波谲云诡的时代环境和开放包容的文明场域中实现了互识沟通,绘就了全球文明联动发展的大写意。中华文明现代力量致力于构建以中华文明和社会主义为基础定向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彻底摒弃了资本主义文明排他、独断、霸权的思维方式,开辟了人类走向“真正的普遍的文明”的现实途径,彰显出主体性、超越性和世界性的新现代性内涵^[17]。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世界历史叙事是在全球化视野中进行审视的新型话语表达,具有跨民族、跨文明、跨价值观的可对话性、可理解性和可接受性,深化了对中华文明历史方位和发展趋势的科学认识,使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契合了人类整体的发展诉求。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话语叙事既遵循了文明发展的普遍逻辑,又将人的生存发展提高到文明的高度,以讲述普遍道理、呈现共同价值的话语方式走向世界;通过打造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人类文明体系新范式,向人类提供了富有普遍意义的文明叙事样态;有效凸显了用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把握中华文明现代创制的主导权,展现了中华民族从文明蒙尘走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真实历程;实现了对西方文明“以时间换空间”“见物不见人”叙事逻辑的超越,在丰富和拓展人类文明传承发展的实践中破除了西方文明“优越而具有普世价值”的话语迷思。

四、结论

中华文明绵延不绝、辉光日新,其保持持久活力的根本在于顺应时代变革而持续推进自我更新。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基于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并在此过程中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为古老文明注入了新的生机活力。中华文明现代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赓续和推进中华文明的强大合力,是区别于现代西方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实力,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力、创新力与包容力。以世界历史逻辑而言,中华文明现代力量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以文明和谐发展的时代主张推动了人类现代化进程,以自立自信的精神气度和开放包容的文化姿态面向未来,蕴含着人类文明发展的价值诉求。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秉持胸怀天下的世界意识,构建一种符合世界各民族需求的文明逻辑,中华文明必将重焕荣光,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必定越走越宽广。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文化遗产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 [2] 仲音. 三个维度感悟中华文明现代力量[N]. 人民日报, 2024-12-05(1).
- [3] 董辉, 王秀. 中华文明现代力量与人类幸福的实现[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54(2): 56-64.
- [4] 夏巍, 高伦. 中华文明现代力量: 唯物史观具体化的中国实践[J]. 教学与研究, 2025(3): 41-50.
- [5] 王波, 黄正霖. 中华文明现代力量的世界历史展开[J].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5(1): 28-38.
- [6] 布罗代尔. 文明史: 人类五千年文明的传承与交流[M]. 常绍民, 冯棠, 张文英, 等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 40.
-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8]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2.
-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5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138.
- [12] 伍德. 资本主义的起源: 一个更长远视角[M]. 夏璐,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175.
- [13] 马兹利什. 文明及其内涵[M]. 汪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8.
-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8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206.
- [15] 潘泽泉.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时间向度[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31(2): 29-41.
- [16] 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48.
- [17] 马云志, 赵荣锋. 批判、建构与超越: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性逻辑[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31(1): 136-148.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n the world historical narrative of the modern power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DUAN Guangpeng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The modern power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the civilized achievement of the great practice of Chinese-styl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ts discourse originates from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drive of “time” and “potential” in the logic of world history,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defense” and “change”, and the overall consideration of “one” and “many”. Based on the discourse presentation of the modern power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n world history, it should be expla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following the “universal regularity” of national culture as the main narrative, adhering to the socialist “people-centered” transcendent narrative, upholding the dialectical narrative of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of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ve narrative of “prior presupposition” of world history. From this, we can deeply understand the creative power of the CPC to create a new form of civilization on the basis of understanding the original and absorbing foreign cultures. The creative significance of the modern power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is not limited to China, but has a discourse direction that transcends the vision of the nation-state, which is conducive to providing a new civilization narrative scheme for refuting the Western centrism, providing a new civilization narrative guide for expanding Chinese-styl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providing a new civilization narrative pattern for promoting the evolution of human social morphology.

Key words: the modern power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world history; discourse narrative

[编辑: 郑伟]